

人物 双月刊

张鼎丞自传(早期部分)		3
他心里总是不忘人民		
——怀念张鼎丞同志		
	鲁 坚 沈国祥	10
当代	他, 才二十六岁(报告文学)	肖复兴 25
青年	“华丽家族”的主人	熊海钧 96
李富荣与乒乓球		鲁 光 50
怀念集	宣侠父与左联	阳翰笙 42
	我们的外祖母葛健豪	刘 昂 李 特 88
铺路石——地质学家尹赞勋教授		谢翠华 江 晓 71
书信	张元济致鲍咸昌函	59
日记	附: 先父张元济不准我进“商务”	张树年 60
林语堂述评		
——兼谈他同鲁迅		志浩 108
关于刘半农的片断		锦第 154
漫话柳亚子		伏琛 156
柳亚子在津南村		宋吉生 杨 珣 159
美学家王朝闻		王行之 61
高云览和他的《小城春秋》		高迅莹 149
罗炳辉将军与吉安起义		石肖岩 128
傅秋涛将军和《中国民兵史》		周树昌 133
老将军童陆生义务行医记		陈允豪 145
武宁上将李烈钧		李希泌 101

问
题
讨
论

关于传记作品的写作问题

从《史记》看传记写作	田居俭	137
传记的特点与文学的长处	虞挺英	140
文华而不失实	道弘	141
传记作品应着意写人	子真	142
略谈介绍反面人物	余也	143

六十依然是小丁——记漫画家丁聪	朱继功	80
版画家力群青年时代剪影	薛蕊	164
访女篆刻家刘淑度	吴朗	20
《刘淑度刻石残存集》序	冰心	24

捷尔任斯基战斗生活片断	冯伟民	187
-------------	-----	-----

人物评价	论司马光(163) 简论鲁肃(163)
争鸣动态	李陵的变节行为不值得歌颂(162)

左宗棠“舆榷出关”	杨东梁	169
曾纪泽“探虎口索已投之食”	隋喜文	176

“贪污之王”和坤	张羽新	180
----------	-----	-----

滴水集	两副对联(49) 哀悼朱自清的挽联(127) 范仲淹不树园圃(158)
	谢老得知失火以后(184) 徐老的粉笔诗(184) 高士其改名
	(184) 卢梭勇于剖析自己(184) 邹韬奋拒做“陈布雷第二”
	(185) 王阳明教条四则(185) 王一亭的一字师(186) 鲁迅
	谈“母爱”(186)

人物 双月刊

张鼎丞自传 (早期部分)		3
他心里总是不忘人民		
——怀念张鼎丞同志		
	鲁 坚 沈国祥	10
{当代 青年}	他, 才二十六岁(报告文学)	肖复兴 25
	“华丽家族”的主人	熊海钧 96
李富荣与乒乓球		鲁 光 50
{怀念 集}	宣侠父与左联	阳翰笙 42
	我们的外祖母葛健豪	刘 昂 李 特 88
铺路石——地质学家尹赞勋教授		谢翠华 江 晓 71
{书信 日记}	张元济致鲍咸昌函	59
	附: 先父张元济不准我进“商务”	张树年 60
林语堂述评		
——兼谈他同鲁迅		志浩 108
关于刘半农的片断		锦第 154
漫话柳亚子		伏琛 156
柳亚子在津南村		宋吉生 杨 珣 159
美学家王朝闻		王行之 61
高云览和他的《小城春秋》		高迅莹 149
罗炳辉将军与吉安起义		石肖岩 128
傅秋涛将军和《中国民兵史》		周树昌 133
老将军童陆生义务行医记		陈允豪 145
武宁上将李烈钧		李希泌 101

问
题
讨
论

关于传记作品的写作问题

从《史记》看传记写作	田居俭	137
传记的特点与文学的长处	虞挺英	140
文华而不失实	道弘	141
传记作品应着意写人	子真	142
略谈介绍反面人物	余也	143

六十依然是小丁——记漫画家丁聪	朱继功	80
版画家力群青年时代剪影	薛蕊	164
访女篆刻家刘淑度	吴朗	20
《刘淑度刻石残存集》序	冰心	24

捷尔任斯基战斗生活片断	冯伟民	187
-------------	-----	-----

人物评价	论司马光(163) 简论鲁肃(163)
争鸣动态	李陵的变节行为不值得歌颂(162)

左宗棠“舆榷出关”	杨东梁	169
曾纪泽“探虎口索已投之食”	隋喜文	176

“贪污之王”和坤	张羽新	180
----------	-----	-----

滴水集	两副对联(49) 哀悼朱自清的挽联(127) 范仲淹不树园圃(158)
	谢老得知失火以后(184) 徐老的粉笔诗(184) 高士其改名(184)
	卢梭勇于剖析自己(184) 邹韬奋拒做“陈布雷第二”(185)
	王阳明教条四则(185) 王一亭的一字师(186) 鲁迅谈“母爱”(186)

張鼎丞自傳

(早期部分)



张鼎丞同志在1941年曾写过一份自传。征得张鼎丞同志家属同意，这里刊载了其中的早期部分。发表时，曾在文字上做了少量改动。——编者

1 我生长在福建永定县溪南地方。戊戌政变那年出生的，到今年四十三岁了。出生时祖父命名张福仁，到高级小学读书后即改用张鼎丞的名字。

我幼年时候家庭穷苦，常常被人欺侮。邻居的老太婆常常讥笑我，“你总是学你祖父穿烂裤子，睡灶炉角，吃蕃薯粥”。我十三岁那一年（我祖父死后二年），有过这样一件冤枉事：我祖父生时买过本乡和尚一些谷子度荒，我祖父死后，因和尚欠了粮赋，贪官污吏就把吞食钱粮的罪名加到我家里来，横加勒索，甚至捣毁锅灶，牵去猪牛，还要拘捕我父亲。同年秋天，我家秋收后除缴纳租谷之外，只剩下几挑谷子，放在家里，一个晚上被盗贼偷了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发觉了失去谷子，全家老幼大哭。“人善被人欺”，这些含冤苦况，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成年了，父母要为我找一门亲事，可是许多女儿家都嫌我家贫穷，不肯答应。当时我父母非常悲愤，嗟叹“命运不好”。殊

不知私有制度底下，嫌穷爱富是不可免的。

我的家乡——永定，接近厦门和汕头，交通相当便利；出国华侨和往外营商的人相当多；文化教育相当发展；农产物和手工业产品（粮食、木材、条丝烟、纸张等等）相当丰富；商业也相当发达。人民勤劳节俭（妇女都是劳动的）。可是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地主资本家对永定人民的压迫剥削，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残酷，造成社会混乱、经济破坏，人民痛苦不堪。

我的家庭几代都是贫农，我的祖父和全家老幼都很勤俭，我祖父一生勤劳，直到七十余岁死的前四天，还在劳动。我祖父是没有上过学堂的，可是他肯学肯问，到他晚年也是颇具文化的人了，曾充当过私塾先生。我母亲也是勤劳不息的人，甚至她怀孕到了临产（生我小弟）的前三个钟头，还在田里收割稻子。家庭生活非常俭朴，我祖父穿的一件棉袄，给我父亲又给我，共穿了三代人五十余年。我祖父常常教训我们说：勤俭者，少求人。

由于家庭穷苦，我六岁就跟母亲上山砍柴和照顾小弟弟，十岁就牧牛和做较轻便的耕田事情。同时这些年头里也到私塾读书，十三岁到初级小学读书。到十六岁那一年，脱离家庭事务，进入区立高级小学，至十九岁夏季毕业。我在学校里极其遵守校规，用功读书，因此学业得以进步，得到教职员和同学们的称赞。

高级小学毕业以后，无力升学，于是当小学教员，自二十岁起就以教书为职业，度过了十年的教书生活。在这十年中间与同校教职员团结一致，进行教育工作，取得了教学进步。同学生和学生家属的关系也很亲密。因此我在本县小学教育界有相当威信。

我自幼受过“旧礼教”的熏陶，所以当时很尊重“礼教”，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尊师重道”，真的去身体力行。很信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所以我自从到小学读书及其以后十年的教书中间，都是循规蹈矩不越轨范的。虽然受到当地人士的同情和赞许，可是这样就会变成一个老实

的庸人，限制在落后之中。由于只凭自己老实的人品去应付欺诈险恶的旧社会，所以常常碰壁。在大革命时期1925—1926年，我被选为本乡乡长兼小学校长，当时曾抱着满腔热忱，企图改造乡村的不良风气（如贪污土劣分子的腐败现象），虽然在有些事情上做了一些改善，可是无法改变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派饷派伏，苛捐杂税等无恶不作的事情。以后，又另走极端，感到对这样的社会消极悲观，自己无能为力，以为军阀官僚的恶社会是莫可奈何的。因此，曾抱着“洁身自好”的观念，企图离群索居，想去做“隐士”，也学过中医。当时真是徬徨歧路。这就是我未找到共产党以前的情形。

2 由于家乡永远存在着革命的客观基础，甚至于直接或间接经历过革命的洗礼（如辛亥革命以后每一次革命，特别“五卅”以后的大革命）。革命的澎湃潮流，激动着我，逐渐引导着我走上革命的战线。

我的家庭和自己受尽了压迫剥削，对于剥削压迫的黑暗社会，是极端痛恨的；这就使得我容易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共产党的主张。同时我曾抱着正义的观点，企图借旧礼教及其方法来修养自己和改造自己周围的环境，结果遭到失败，正在想法寻找新的道路，这就使自己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5—1927年大革命中间，闽西开始了蓬勃的革命运动，我参加过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当时曾想加入国民党来参加革命活动，可是又感到永定的国民党内有不少党员是贪污土劣的分子，因此我不愿意加入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发来委任状，委任我为国民党永定县党部常务委员兼农民运动指导员的职务，我也拒绝不肯就任。我的态度是“择善而从”，而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及其大公无私，正好适合于我的要求。

我于大革命时期开始读到了共产党的书刊，如《共产主义ABC》、《向导》、《中国青年》等，并接近了阮山、林心尧、饶龙光、张高友等共产党人，听了他们的宣传，我非常钦佩共产党及共产党

的主张。我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社会，非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不可，非进行阶级斗争不可。因此我就急于寻求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可是很久未得门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饶龙光、张高友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

3

自从加入共产党以后，我就开始以革命为职业，在家乡永定进行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党的和群众组织。由于群众对反动统治的剥削压迫的仇恨；由于国民党当时还非常混乱而对于闽西的统治还很薄弱；由于我们党的主张和政策适合群众的要求，我们的口号和工作方式也灵活，因此我们很快就把民众动员起来，争取到我们党的周围。1928年初，在我的家乡——溪南金砂就发动一个年关斗争，反对屠宰捐等苛捐杂税，这一斗争得到完全的胜利。1928年春荒到了，我们就提出“借谷度荒”、“借牛春耕”的口号去动员群众，向地主斗争。这一斗争胜利开展时，我们立刻又提出更高的口号，“平分地主和公田的粮食来度荒”（即“分粮吃大户”），扩展了群众斗争。春荒斗争不仅在溪南开展起来，而且影响到永定其他地方。当群众的阶级斗争急剧高涨的时候，地主豪绅恐慌起来，到处说：“永定农匪猖狂”，于是永定县政府于4月初召集全县土豪劣绅会议，决定“清匪”计划，进行“清乡”活动。

在春荒斗争中，我们发展了一千名左右的党员，六千名以上农会会员，一千五百名以上的青年半武装组织（铁血团）。当时我们（溪南的党）估计群众的热情和斗争的决心，估计统治阶级要施行其“清乡”计划，因此向中共永定县委提议实行“武装暴动”来抵抗统治阶级的“清乡”。当时全县除溪南有强大的群众组织基础外，金丰、湖雷等地区，也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也曾发动过或多或少的斗争。县委接到我们的建议之后，即于4月间召集全县党代表大会，在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决定立刻在各区扩展民众武装组织并组织指挥暴动的机关，争取与闽西各县群众斗

争联系和配合起来。当时指定我负责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党代表大会曾选举新的县委员会，加强永定党的领导，我也被选为中共永定县委委员。在代表大会之后，就立刻紧急动员民众武装斗争。

统治阶级在其“清匪”会议之后，果然立即实行其清乡计划，派驻军（张贞的部队）于4月下旬包围溪南区，捕去多人（内有我们的党员）。在反革命的“清乡”中，群众非常愤怒，我们即发动群众进行营救运动，并乘机发展民众武装的组织，布置武装斗争。这一运动得到群众的拥护。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都要求迅速进攻永定城，抢救被捕的人士，于是我们于1928年5月14日实行了武装起义，动员数千武装民众攻进永定城，与驻军和民团警察战斗之后，我们就实行乡村暴动，进行“焚烧田契债券”、“没收地主土地和粮食”、“建立乡村工农代表苏维埃政权”、“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组织普遍的民众武装”的斗争。在溪南武装暴动开始前后，我们党立刻领导金丰、湖雷等地群众也武装暴动起来。这一武装起义震动了闽西各县。当时上杭、龙岩各县也展开了武装斗争，配合了我们。

中共福建省委知悉永定武装起义事件，立即派代表团由王海萍同志率领来闽西，统一闽西的武装斗争。7月成立了闽西暴动委员会，并成立中共闽西特委，我和邓子恢、郭滴人等同志被任为特委和“暴委”委员。并决定将永定、龙岩、上杭各县起义的武装群众，成立三个团，番号为红军五十七团、五十八团、五十九团，我兼任五十七团团长。于是闽西革命武装斗争就统一起来。

1928年在闽西民众武装起义中，我们党首先在永定溪南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动员民众选举自己的代表，建立各乡工农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府。于8月中旬召集溪南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并颁布了各种临时的法令（如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建立革命的秩序。

闽西起义后，游击战争曾向闽西各县发展，约半年之久。由

于整个反动统治集中力量进行摧残，由于武装起义的地区尚狭小，由于自己还缺乏经验，武装斗争于当年冬季受到暂时的挫折，然而土地革命的种子已播撒在民众中间，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1928年冬，朱德、毛泽东同志领导工农红军第四军，突破反革命对井冈山围剿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于1929年春到达闽赣边时，把闽西反动统治的支柱郭凤鸣军阀部队完全消灭了，并在长汀把郭凤鸣打死了。胜利声中，我曾领导永定的游击队，去进攻永定湖雷的驻军，以配合朱、毛红军的行动。闽西革命又活跃起来了。

不久，朱、毛红军就到了龙岩、上杭、永定地区，5月间又把驻龙岩的军阀陈国辉部消灭了。这时候闽西人民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岩、杭、永的临时革命政府，我曾任当时的永定县革命政府主席。

为了保证闽西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发展，朱德、毛泽东同志指导闽西的共产党和各县革命政府，必须广泛地建立地方民众武装和创造坚强的主力部队。我们立即响应和坚决执行这个指示，迅速动员革命的民众武装起来，建立广大的赤卫军，十六岁至四十岁的男人都加入；并组织脱离生产或半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同时把各县精干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建立闽西的主力部队——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四纵队。我被任为第四纵队的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这个纵队得到朱、毛的领导和主力红军的帮助，如调来胡少海同志任司令员，谭震林同志为政治部主任，还调了许多干部来加强领导，并发给武器。这支部队日益强大起来了。

第四纵队自7月成立以后，还配合主力红军打下上杭城，消灭军阀卢新铭部，开展汀南（长汀县南部）、连南（连城县南部）、上杭和武东（武平县东部）等地的工作，获得许多胜利。

闽西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直接指导下召集了闽西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大会上检查了闽西党的工作，总结了闽西

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闽西土地革命具体地表现了群众的斗争性和创造性（指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田的办法）。大会还议决了许多问题，如扩展土地革命的斗争，召开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扩大与加强第四纵队，发展游击战争等等。毛泽东同志于1930年元旦，在闽西广大群众庆祝红军胜利大会上说：“闽西开始了胜利的土地革命。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又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广大的赤卫军、游击队和红军第四纵队。革命的更大胜利，是一定会到来的。”

1929年12月，敌人对朱、毛红军和闽西的共产党实行“三省会剿”。为了打破这个“围剿”和扩展土地革命，并把闽西与闽赣的革命打成一片。我率领第四纵队随朱、毛主力红军到赣南和粤东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结果把敌人的“三省会剿”打破了。第四纵队得到加强，闽西区域的革命也发展了。

第四纵队随主力红军出击，经过半年之后，调回闽西活动，到1930年10月扩编为红军新编第十二军。这个军队当时负责在闽粤边开展游击战争。

闽西的革命经过主力红军帮助之后，永定、龙岩、上杭、长汀、连城各县的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起来，为了统一对各县政权的领导，根据中共闽西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召开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经过半年的选举活动和各方面的工作，于1930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在龙岩县城庄严地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是闽西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真正民主政治的会议。大会议决了各种重大的问题，颁布了各种临时的法令。大会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子恢、张鼎丞、郭滴人、范乐春等三十七人被选为委员，正式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

闽西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经过三年多的奋斗，获得了光荣的胜利。

他心里总是不忘人民

——怀念张鼎丞同志

鲁 坚 沈国祥

1982年1月1日上午，一架草绿色的“安二”型飞机，从闽南的一个机场起飞，把张鼎丞同志的骨灰，撒在他长期战斗过的八闽大地。我们敬爱的老首长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那刚毅慈祥的音容笑貌，仍然时时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他那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德，他为革命事业创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路遥知马力”

1939年5月，鼎丞同志正在江南抗日前线，突然接到党中央的电报，要他立即去延安工作。他匆匆告别了战友们，经过长途跋涉，于7月间到达延安。毛主席在窑洞前热情地迎接张老，深情地说：“你回到家了。路遥知马力啊！”毛主席的这句话，是对张老1928年领导农民暴动以来，一直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坚韧不拔地为革命事业顽强斗争的确切评价。

1928年春，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红四军入闽。张老和罗明、邓子恢同志领导闽西的党和游击队，

积极配合主力红军，解放了上杭、龙岩、永定等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烈火燃遍了闽西大地，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并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毛主席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中写的“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是对当时闽西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

1931年以后，王明教条主义者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使闽西革命根据地遭到重大损失。张老当时担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在实践中感到王明的一套对革命不利，也行不通，就进行了抵制和斗争。那时候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闽西开展了以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的肃反运动。张老目睹一些同自己一起参加暴动、英勇斗争的好同志，被刑讯逼供，甚至被无辜杀害，对肃反运动表示怀疑，多次提出了不同意见，结果被指责为“对中央路线动摇”，不许他再过问肃反问题。后来他和郭滴人到瑞金开会时，向毛主席汇报了闽西肃反的错

误做法。毛主席听了，非常严肃地说：“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毛主席拨给他们数千块银元，要他们立刻回闽西放人，做好善后工作，这才制止了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挽救了一大批干部。

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临时中央领导人下车伊始，就指责游击战争是“游击主义”，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扩大主力红军”，执行“进攻路线”，搞“正规化”、“阵地战”，强令各县的地方武装，连人带枪全部编入主力红军。张老认为，在龙岩、上杭、永定这些边沿地区，虽然也要扩大主力红军，但是应该允许他们保留一些地方武装，以便开展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益，保卫苏区，所以他坚决支持代理省委书记罗明同志要求中央改变这种做法的意见。本来这些意见都是符合群众的愿望和当地斗争需要的，但是临时中央却认为福建省执行了以罗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退却逃跑路线”，决定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不久，在中央代表的亲自主持下，对张老进行了反复的批判斗争。最后撤销了他的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

1934年1月，张老被调到瑞金，名义上任中央副粮食人民委员，实际上只是让他在下面做征集粮食的工作。但他仍然满腔热情地到处奔



1976年在北京

走，为筹集粮食而勤奋工作，提前完成了中央要求集中八十四万担军粮的任务。正当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的时候，因红军长征北上，中央又命令他立即把没有运走的粮食发还给群众。当时广大群众是多么希望红军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啊！他们哭泣着说：“我们要红军不要粮食！我们要红军不要粮食！”张老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才把粮食发还给了群众。可是等他处理完粮食回到瑞金时，红军已经走远了。面对着革命遭到失败的景象，张老不由得满腔悲愤。他想起毛主席在宁都养病时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当时毛主席已经预见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将会遭到失败，意味深长地对他说：“鼎丞同志，将来你还是回到闽西去吧，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他是多么怀念正

在遭受敌人蹂躏的闽西人民啊！留在瑞金的陈毅同志很了解张老的心情，向项英同志提议，让鼎丞同志回闽西去打游击，项英同意了。

1934年底，张老离开瑞金，先到了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的四都，见到了当时的省委书记王永诚同志。王永诚还是采用硬拼硬打的办法，把红军的两个主力团和许多游击队，集中在山上，到处构筑工事，提出“保卫四都”“保卫省委”，准备与敌人“作殊死的决战”。张老建议他赶紧分散力量打游击战，万执意不听（后来全军覆没，万也牺牲了）。王永诚同意张老去岩、永、杭，可是只给他一个省委特派员的名义，不给一个战士，也不给一支枪。张老只好与刘永生、范乐春、陈茂辉等同志，从修械所找了几支旧枪，身背土造手榴弹，离开四都向永定进发。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闽西集中八个正规师的重兵，反复搜山追捕红军游击队，形势十分险恶。张老一行，依靠苏区干部和群众帮助，专选敌人已经放火烧过的山走，昼伏夜行，历尽艰险，才到达永定县西北的老根据地合溪。

张老回到永定以后，很快与留在闽西的红八团、红九团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在他的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打了一个胜仗，大大鼓舞了士气，群众欣喜万分，奔走相告：“鼎丞带领主力红军回来了！”不

久，陈潭秋、谭震林、邓子恢同志带领红军一个营，从瑞金突围到永定与张老会师，成立了以张老为首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老领导闽西的党和红军游击队，坚决纠正了左的错误做法，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开展了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非常残酷的。留在闽西的红军游击队为数不多，并且在很长时间里与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在敌军重重围困下，红军游击队经常处于无粮无衣的困境。但张老始终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念，与全体干部战士团结一致，风餐露宿，患难与共。由于他们与群众有着血肉般的紧密联系，终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保存和发展了有生力量，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张老的一家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928年他领导永定暴动以后，家里的房屋全被敌人烧毁。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弟弟炳元，是中共永定县委军事部长，1928年11月被捕。敌人得知他是张鼎丞的弟弟，对他严刑拷打，妄图通过他破坏闽西的党组织和捕获张鼎丞，但是炳元坚贞不屈，未说出一人一枪，敌人气急败坏地把他枪杀在永定县城。张老另一个弟弟张智，1929年调到中共福建省委工

作，一次去白区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张老的父亲1935年春不幸被捕，惨遭杀害。1936年夏，张老的母亲（在我交通站工作）被敌人逮捕后关在永定县监狱。敌人扬言只要张鼎丞投降就可以释放她。张老是很爱他母亲的，但对敌人的这种卑鄙伎俩根本置之不理。他母亲在牢中受尽折磨，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才被释放回家，但已生命垂危。那时张老是多么希望能去看望一下母亲，但因刚刚担任新四军二支队司令员，忙于部队北上抗日的准备工作，虽然离家只有一百多里，还是没有回去。不久，他母亲终因伤重病逝，他仍然未能回去料理丧事。直到他率领部队北上抗日时，才到母亲坟前致哀告别。村里的父老们告诉他：“你母亲临死前一再说，告诉鼎丞不要悲伤，要努力工作，尽忠革命。”这时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热泪滚滚而下。他在母亲的坟前，向前来送别的父老兄弟讲了话，表示一定要忠于人民，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张老对他亲属的牺牲是极为悲痛的，他经常以此来激励自己和战友们，更加顽强地跟敌人斗争。

“要把人民的生活时 刻挂在心头”

1958年秋，正是南方稻谷成熟的时节，张老视察工作到了福建。他从福州乘车去闽西，沿途看到稻

子长势很好，金光灿灿的谷穗告诉人们，收割的时刻已经到了。可是，为什么一路上只看到一些老人和孩子在田里收割而看不到壮劳力呢？当汽车从漳州拐向去龙岩的公路以后，他看到一队队背着背包的青壮年。他几次停下车来询问：“你们是在干什么的呀？”人们回答：“我们是调来大炼钢铁的。”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一到龙岩，他就到城郊的田间去观看，见到不少田丘里撒落着成熟的谷粒。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回到住处就对我们说：“明天我们一起割稻子去。”这一下可惊动了地、县的领导干部，他们也跟着去了。在休息的时候，张老就问他们：“明年你们还吃不吃饭啊？多么好的稻子糟塌掉，怎么对得起群众呢？”当他了解到主要是炼钢铁的压力太大，挤掉了秋收的劳力时，就亲自打电话给省委负责同志。省委决定就在龙岩召开部分地委书记会议。会上，张老指出：秋收是群众最关心的大事情，炼钢铁可以推迟几天，稻子熟了是不能推迟收割的，建议立刻集中力量来突击完成秋收。省委负责同志都很尊重张老的意见，决定在秋收没有完成的地区，暂停炼钢铁，突击搞好秋收。1958年，我们党的工作上已经开始出现左的错误。张老和广大干部、群众一样，都盼望尽快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所以一路上他也积极宣传“三面红旗”，支持

“大跃进”。但是当他遇到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的问题时，他总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改变工作部署的建议。他的这种实事求是，关心群众利益的作风，使我们深受教育。

1960年，张老不断接到群众来信，反映农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他老家也派了几个社员来找他，告诉他那里的群众口粮太少，吃不饱饭。他知道这些情况后，心中焦虑万分。1961年初，他下决心要再次去闽西，亲眼看看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这一年的春节，他没有在北京过，就带着工作组兼程南下。当时闽西的形势确实很不好，粮食产量急剧下降，比解放初期的产量还低。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群众吃不饱饭，体质很弱，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干部、群众的情绪低落。张老看到这种状况，十分痛心。那时他的健康状况不好，血压很高。我们劝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他说：“闽西人民为革命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和贡献，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我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他和省、地、县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帮助当地妥善安排群众的生活，抓紧给群众治疗疾病，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干部说：“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生活得怎么样，这是头等大事。我们应当把人民的生活时刻挂在心头。谁要

是忘记了这一条，就不配做共产党的干部。”

闽西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原来当地认为，主要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混入内部进行破坏”，因此确定解决问题的方针是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但是，干部、群众却纷纷向张老反映，这个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并且揭发了前两年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的事实。他带来的工作组通过复查这个地区1960年逮捕、判刑的案件，也发现绝大多数是由于缺粮生活困难而进行的少量偷窃、私宰猪牛和对“五风”有不满言论的群众，阶级敌人破坏的案件只占极少数。这个情况引起了张老的深思。他反复地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闽西是我党领导的一个革命老根据地，解放前一直红旗不倒，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民主革命；解放后进行了土改和镇反运动，1954年到1955年又进行了“土改补课”，怎么会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呢？为什么当地的领导和群众的看法这样截然不同呢？为了弄清问题所在，他亲自到龙岩、永定、上杭、武平等县，深入到一些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同干部、群众座谈，还让工作组分别选择了两个点进行调查研究。一个点是原来就认为民主革命彻底的永定县西溪公社，调查证

实“五风”是造成形势不好的主要原因。另一个点是龙岩县江山公社。原来认为这个公社是闽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典型。工作组详细查阅了这个公社历年来政治、经济情况的资料，分别找干部、群众座谈，并对在“民主革命补课”中定为漏划地主、富农，以及混入内部进行破坏的阶级敌人的案件，逐案进行审查，结果基本上都被否定了。这个公社是一个革命的老区，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土改、镇反基本上都是彻底的，并且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7年以前，粮食产量是逐年上升的，而1958年以后，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造成群众生活严重困难。事实证明，这个公社形势所以不好，主要是贯彻执行了上级的一系列错误指示，大刮“五风”的结果。

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根据大量的事实材料，张老认为可以断定，这几年闽西形势不好，并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主要是“五风”造成的。这时邓子恢同志也到了福建漳州，张老闻讯立刻赶去向邓老谈了有关情况和他的意见。两老一起到了闽西，随后省委的几位书记也来了，他们共同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反复地研究了当地的问题，张老和邓老明确指

出，根据闽西的实际情况，当务之急是，领导上应对前几年大刮“五风”承担责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广大干部放下包袱，彻底纠正“五风”，迅速贯彻“六十条”，这样才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尽快扭转局面。省、地委的领导同志都同意两老的意见，重新部署了工作。

在闽西期间，张老一直感到正确对待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通过在闽西的调查研究，发现很多干部思想情绪不稳定，怕犯错误，怕挨斗争，怕受处分，因此有些干部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办事总靠“左”边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这几年对于干部的惩办主义比较严重。动不动就“拔白旗”、反右倾、停职反省、撤职集训。名义上也搞整风，实质上完全违背了延安整风



1961年于龙岩。右起：邓子恢、张鼎丞、叶飞、伍洪祥